

西太平洋海權競逐史略

海洋秩序觀點下的歷史驅動能量研析

著者/何耀光

海軍官校正期73年班
南非軍事情報學院1996年班
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社會科學博士
歷任海軍軍史館館長
現任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西太平洋地區為吾等世代生息、賴以維生與情感交織的地理區塊，在此先民的歷史點滴以及現代與未來之間相互交錯，形構成特定的認知與感懷，因此，以理解過去為所以研究的初始，並為後續研究的起點與基礎認知的再釐清成為研究區域權力競逐結構的重要目的。翻閱史料可以發現：我國儘管靠海，但卻未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以及海洋所帶來的利益。長期以來，吾等身處西太平洋這個權力糾葛、經濟成長巨大變動的地區，但對於這個連接東亞與世界上最大海洋的西太平洋地區卻又相當陌生。歷史的發展為何形成如此詭異的現象？空間、時間與人類的意志、科技交織出情況迥異的歷史，然而世間有否命定的因數？筆者認為，透過對歷史事件的檢驗，將可以發現區域中主要強國之所以能支配區域事務的歷史發展脈絡或模式。故若能充分理解歷史脈絡之間的變化，則可洞悉西太平洋地區，長久以來的歷史發展，作為解釋歷史事件、理解現實問題、尋找問題發生的核心因素、甚至預測未來發展可能性的重要方式。

壹、緒論

修西迪底斯（Thucydides）曾說「歷史會在未來的時間裡，以不同的型態，重複出現」¹，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人類不曾自歷史中學到任何事情」²的說法，雖然說明了「歷史重複出現」的原因，但未能說明驅動因素為何。因此，若要尋找西太平洋海權發展的「歷史結構」，則不但要發現不受外在因素影響而「長期存在的東西」³更是要理解區域中主要強國（如中國、俄羅斯、日本、英美等西方海權國家）在地緣條件下的歷史發展脈絡

或模式。透過對長久以來影響歷史發展的「驅動力」之探索，進而能提供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歷史事件的發生？尋找問題發生的核心因素與影響歷史發展的結構性驅動能量。如此研究，較之於當下許多僅以飄邈的「概念」敘述空洞、缺乏實證能的「套理論」型研究，應屬更為務實的學術「功課」。

我國在四面環海，但在對於海洋與海權的理解與研究上，卻長期受到強烈的大陸性思考所限制。表現在對於「軍史」的理解上，竟是片斷性的「戰史」堆砌，對「地緣」的理解，總是侷限於台海週邊，此問題的核心根源在於海權思想之建構，從軍官養成教育

（基礎教育）開始，就出現嚴重缺陷。⁴將海權概念的建構，簡化為海權史課程，而在缺乏地緣戰略與國際關係、權力政治的概念下，歷史教育被孤立於戰略思考之外。透過事實上的教學經驗發現，軍事歷史的教育，若不能透過地緣政治學的檢驗，很難建構描述特定地區或問題時的視野與觀察，進而能掌握外部事實，以及其中存在的關鍵性特徵，來進行思考、分析。因此，構思以西太平洋為區域界線，作為理解軍事行動與政治決策的平臺，形成抽象、簡化與模型概念，以解讀各國的軍事目標之中相關地理特徵，政治決策者如何決定戰略的優先次序等疑問。進而提供海軍戰略研究者，對於此等地緣政治參與者之間的關係、行為模式的簡易理解途徑，以供戰略上解釋、研判，或甚預測的理論基礎。

貳、權力競逐的序幕與初步建構

西太平洋海權競逐歷史紀錄的序幕，係由古代中國的海上冒險展開，中國人運用舟船進行征戰的開始，約於西元前549年的楚康王伐吳之役；⁵另外，大規模的海戰則發生於西元前482年，越國「發流習⁶兩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再依據戰國時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鑒」之圖形記載，可知當時的戰船係雙層槳船，其下層為划槳的水手，而上層則為作戰的兵士。⁷至於大規模的海洋貿易則應可溯源自漢代，而以唐代為海洋活動巔峰的肇始，其海貿所以興盛，係導因於歷代所累積的優異造船工藝，而宋、元時期的長期海上發展，更為成鄭和海上揚威行動的基礎。因此，鄭和的航海壯舉應被理解為歷代出入海洋的延續。⁸事實上，15世紀稱霸世界海洋的中國，並非奇蹟而是逐步積累的結果。相對的，為何突然消失於海上？亦有其結構性因素。筆者認為：

古老的中華帝國確實存在著發揚海權的重要驅動力，也就是「貿易」，然而其貿易行為受限並依附於「朝貢體制」之下，「利潤」引發的刺激，明顯的比西方有著更多的壓抑。大體而言，中國的「天下觀」數千年以來並沒有基本上的改變，其對外認知，總是「以古驗今，戎敵之情，宜不相遠」⁹來界定。就文化的深層意義來看，「夷夏之辨」在思想根源上是「華夏中心論」和「文化正統論」在外來文化衝擊問題上的回應，可視為跨文化交流之中，外來文化溶入中國過程中的「文明衝突」形式。而對此問題本質的體認，筆者認為必須與古老帝國的統治、支配能力與工具等三方面一併思考。在「華夷天下觀」之中，對涉外事務採取「不理原則」的核心思維，實為統治工具不足狀況下的反應。當「朝貢貿易」僅作為內部統治合理化的手段，當明惠帝已不再直接衝擊朱棣皇室的統治權威，加上官方對於海貿的疑慮與制度上的結構性缺陷，對海洋經略的忽視就成為官方長期的思維盲點。然而民間的海貿活動則並未完全禁絕，沿海商業行為與政府管制之間，只有貿易數量多寡的區別。

整體而言，西太平洋的海洋秩序直到1840年代以前，係由中國以非官方直接介入的方式，形成非正式的海商家族力量所主導。

華夷海洋秩序開始遭遇挑戰係起自於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統一日本之後，當時為處理「戰國時期」遺留下大量「武士」而產生的內部安定隱憂，與歷年戰亂所引發的糧食供應、人口結構等社會問題，在政權維繫的思維下，考量「狩刀令」可能引發的反彈等因素，故以對外征戰消耗、減低「武士」對其政權的潛在威脅。因此，挑戰當時的海洋秩序成為日本的戰略選項，而此種「取代式」作為之中，其心理與政治的正當性建構問題，則來自於歷史

上日本成功對抗元帝國入侵所積累的自信心，¹⁰進而為取代中國成為新的「華夷秩序」盟主，建構「正當性」的基礎。然1598年的「露梁海戰」致使450艘艦船遭擊沉或焚毀，在海權盡失的狀況下，終於導致朝鮮的全面敗退；但相對在中國，長年的征戰致使國庫空虛、沿海民生凋弊，也宣告明帝國的敗亡。¹¹豐臣秀吉過逝之後，後繼的幕府將軍缺乏再次挑戰中國的興趣與驅力，西太平洋海域，再次回到中國主導的非正式、非官方系統秩序。至1630年代，由於與歐洲的通商交流逐步發展到日本內部權力鬥爭的範疇，更觸及德川幕府政權維繫的敏感神經，終於導致1640年代之後的「鎖國」回應，¹²亦使日本正式退出地緣政治競逐的場域。然於此同時，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開發與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發現，成為聖彼得堡方面（St. Petersburg）在其與大英帝國對抗過程中，新的希望所在。然而由於天候限制、糧食與補給的需求，加上地理上的「遙遠」，爭取「生存」選項被界定，故無論是出海尋求漁場、海生毛皮的供應，亦或是南下尋找黑龍江上游地區的農產補給，在相當程度上，均宣告在地緣環境下，中日俄三方必然發衝突的結構性宿命。

歸納而言，此一時期的海洋秩序模式，係：由中國的傳統「不理」政策、日本的「鎖國」作為，加上俄羅斯的「力猶未逮」事實所組合而成。此種歷史形勢發展的外在現象是：區域權力結構的鬆散狀態。而此地緣形勢，恰正提供17世紀西歐海洋強權運作的空間，更為新興獨立的美國，提供介入東亞事務的機會與條件。

參、近代的挑戰與回應

美國獨立之初，歐洲諸列強因顧忌英國而設定許多貿易限制，但在太平洋地區則未受影響，相當程度上亦鼓勵美商向亞太地區冒險。對華貿易自1784年，「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首航中國後展開。1789年7月，美國在其第一個關稅法案中，即對從事與中國、印度貿易的美商予以優惠待遇。1819年美國勢力以捕鯨為先導到達夏威夷。1820年代，開始建立太平洋艦隊，以確保太平洋的海洋貿易、捕鯨、捕獵海豹等巨大利益。在國際權力競逐的過程之中，1819年與西班牙簽訂「橫貫大陸條約」（Trans-continental Treaty），正式主張將其西部邊界延伸至太平洋岸。美國應以「太平洋帝國的基礎與出發點」，「以太平洋為自然邊界」的概念漸被確定。¹³1824年的美俄合約，標誌著俄羅斯在地緣壓力下的退場。1844年，以「利益均沾」為名而簽定的中美「望廈條約」（Treaty of Wanghia），基本上是「提出分享要求」¹⁴最惠國待遇的「搭便車」行為。伴隨著競爭對手的式微與經濟實力的攀升，由基督教文明建構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認為「未來是美國的偉大時代」，¹⁵這種新型態擴張主義，係夾帶著特殊的宗教情懷與道德認知，驅動美國邁向東亞。整體而言，不同於早先西歐古老殖民帝國分別因貿易或傳教而東來，美國的擴張是物質與精神，全面性的將其理想、價值觀、民主政體，甚至宗教信仰融合成行為的「道德正當」。1852年，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對擴張本質的注解，係：太平洋與其週邊的廣大土地是未來的主要舞臺，對中國政策的核心則是與世界列強的相聯合，以共同「分一杯羹」。¹⁶

在遠東市場利益考下，蒸汽機動力革命的地緣政治意義，在於燃煤的補給，於是日本成為急欲打開的口

岸。¹⁷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派里（Matthew C. Perry）率艦強迫開港。隨著開放門戶到「大政奉還」再進入「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日本經歷短暫的爭議與動亂後，嶄新的帝國開始呈現，西北太平洋新的地緣競爭態勢形成，日、俄、美三角關係浮現。此其中，美國較傾向於美日關係的建構，包括協助日本的現代化、北海道的開發、台灣問題的暗助等等。¹⁸對於俄羅斯而言，若要保持其強權地位，勢需快速發展經濟，然而版圖太大的問題造成資金無法全面挹注。

19世紀的最後十年，對中日兩國來說時間與國際情勢均達到關鍵點，若不能擊敗對方，則均難以在世界立足。而日本的國內政治局勢，更出現多重危機，最後陸軍主張成為主流，加上西伯利亞鐵路即將通車的壓力，奪取朝鮮成為必需。透過「甲午戰爭」，日本取代清帝國成為東亞強權，但也由於列強的疑慮，造成「三國干涉還遼」，進而種下「日俄戰爭」的前因，同時在中國亦引發列強間的強佔與勢力劃分作為。面對東亞權力平衡的巨變，美國的回應反射在夏威夷的併吞與菲律賓的佔領。但受限於海軍力量不足而陸軍又忙於應付菲律賓叛亂，終促使美國提出「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在1899年9月，海約翰（John Milton Hay）照會要求列強不得獨佔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必須開放市場。¹⁹1900年義和團事件，擔心列強趁機瓜分，又兩度照會「關心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²⁰其實，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於處理惡化的遠東經濟局勢，避免各國排擠美國的在華利益，透過「道德式」、「宣告式」的論述，形構國際行為的「正當性」，再與英國聯合，爭取最有利之機會。對日本而言，地緣情勢在俄羅斯勢力入侵滿洲之後更形險峻，恰於此時，「東方問題」引發的中亞「大競賽」（Great Game），迫使英國在無法同時對抗法、

俄在東亞的擴張狀況下，與東京於1902年簽署「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藉鼓勵日本在滿洲與朝鮮封鎖俄羅斯，以取得日本的合作，維繫英國在中國與東亞的利益。²¹對於俄羅斯而言，其遠東地區距離遙遠，致使建設發展受限，而無法支持人力與財政之大規模轉移，即便西伯利亞鐵路通車，但在歷史上，俄羅斯亦未能進行規模化、計畫性的移民作為，以致在人力與自然資源欠缺狀況下，無法支持在西北太平洋的強大軍事存在。此等地緣因素，亦使得聖彼得堡方面，無法藉由陸上運輸，以解除旅順港（Port Arthur）的封鎖，而使日本藉由港口、兵站、煤站的優勢，進而消滅俄羅斯太平洋與波羅的海艦隊。²²

歸納而言，秩序的調整緣起於新興強權的出現，對西方海權國家而言，權力平衡係傳統的地緣認知與操作模式，因此，透過國際條約的安排，使各權力競逐者，維持穩定的對峙關係，續海洋貿易的運作，即為此時期海洋秩序操作的核心。

「日俄戰爭」意味著戰略三角之另外兩邊的自相殘殺，將有利於美國，樸茨茅斯合約（Treaty of Portsmouth）即顯現此權力平衡的安排。隨著國力的增強與國際地位的提高，「全面性世界秩序體系」的建構，成為美國的戰略核心，在東亞的利益係建構在均等的商業機會與中國的領土完整。就美國認知來看，俄羅斯在中國的擴張是直接挑戰門戶開放核心；同樣，當日本試圖獨霸中國市場時，採取對抗政策亦為邏輯之必然。由門戶開放標示的遠東外交政策特點，在於「透過和平與合法的手段進行擴張」，但相對應的經貿關係、軍事能力、殖民地（菲律賓）安全等，均為牽制美國行動自由的因素。故無論「塔虎托一桂太郎協定」（Taft-Katsura Agreement），

或是「魯特—高平協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均屬實力不足的妥協，其目的在於「希望日本自制」。²³另透過「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政策，對「美國在外國的一切合法、有利的企業給予一切恰當的支援」。²⁴透過美國資本參與投資，使美國在目標國內，獲得更權威的影響地位。²⁵

總體而言，強調國際合作、和平的商業擴張是美國秩序的核心，以大國之間的相互合作與依賴，代替權力政治之中的破壞性競爭。此亦為海洋秩序之中透過經濟、貿易、與制度設計的手段，支持霸權擴張的理論基礎雛型。

一次大戰之後，西太平洋的地緣競爭者減為美、英、日三國，而其地緣政治競賽趨勢，呈現出崛起的日本、衰落的英國與搖擺的美國。戰後，為避免歷史重演、爆發全球性戰爭，而設定的新規範，²⁶期透過軍縮會議、公約，建構解決衝突的機制；透過門戶開放，建構全球化與制度化機制。主流的自由主義者相信，若能透過競爭行為的限制，則能避免戰爭，此即「華盛頓條約體系」(Washington Treaty System)的思維核心。然體系設計的前提，係美日雙方雖以對方為假想敵，但不敢開戰，且相互需求。因此「為緩和關係，避免過早攤牌的妥協」，即為其本質。於是，透過「華盛頓海軍會議」(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九國公約」(The Nine-Power Treaty)、「倫敦海軍會議」(London Naval Conference)等制度安排，成為兩次大戰期間，規範秩序的制度化嘗試。1920年代末期，中國的統一與蘇聯政局的底定，形成對日本的威脅。經濟景氣衰退伴隨天災地震等影響、門戶開放的名存實亡，均顯示新的權力競逐正在積極醞釀。日本侵華初期，美國的態度持續低調，其中有受限於軍力不足，亦有傳統外交意識

形態的因素影響，然而日本則在軍事勝利的鼓舞下，致使外派駐軍與東京參謀本部之間的戰略認知差異擴大，1939年關東軍執意發動諾門罕戰役(Battle of Nomonhan)即為代表，先勝後敗的戰役，不僅為日本帝國的首次嚴重挫敗，更突顯在「保衛滿洲」與「馴服中國」這兩項行動中，日本非但不能獲利，反而是持續消耗其有限的資源，²⁷「大陸內澳是海權無法到達與支配的地區」的戰略意義亦被實證。日本的陸海兩棲戰略，在缺乏地緣因素支撐狀況下，更宣告美國地緣結構的競爭優勢確立。而當華盛頓體系全面崩潰之後，以確保滿洲國，控制中國關內，消除「蘇聯威脅」，打擊美英勢力的「國策基準」，將海外擴張與日本的種族和經濟發展整合的結果，²⁸也宣告美日「終須一戰」的歷史宿命。

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除外在國際局勢因素，更重要的是政府與財閥之間的相互支援，對外擴張有賴於財閥提供的資源，而財閥的利潤機會則有賴於龐大的軍事採購與海外殖民地的投資，²⁹其緊密關係更顯示在軍閥與財閥之間互通、互賴的政治文化與實踐，³⁰最後導致於在太平洋戰爭的戰略設計上，出現「戰略被動」與「畫地自限」的致命缺陷。故珍珠港(Pearl Harbor)襲擊時，未能以摧毀美國的軍事工業再生能力來掌握致勝的關鍵，而至中途島(Midway Islands)戰役之後，即因主戰艦隊的毀滅，而注定戰爭的失敗命運。然而在中太平洋島嶼的反攻行動，與日本在塞班島(Saipan)、硫磺島(Iwo Jima)等地的殊死抵抗，促使美國在結束戰爭問題上，陷入困境，故在外交上一面鼓勵中國抗戰的決心，一面誘使蘇聯投入戰場，但如此操作亦戰後投下兩極對抗的因子。在空襲無效以及可能面對上萬美軍可能因登陸日本本土而喪生的壓力下，兩顆原子彈成為美國的戰略選擇。就地緣的理解而言，美國對戰前日本擴張的反

應，係以其海洋戰略利益為出發，默許日本對朝鮮的擴張，不理對中國的侵略，均因此等行為不涉及美國的核心利益；然而當日本不能謹守只在大陸擴張其勢力，而轉向海洋東南亞的掠奪時，美國的戰略回應，就只能選擇由「禁運」而展開的「對抗」。³¹此點，明白顯示出對於海權國家而言，係將海洋秩序視為不可挑戰的底線。

肆、戰後美國新秩序的設計與政經整體安排

二戰之後，美國以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的理想作為新世界秩序設計的核心，分別在「布雷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聯合國的建立與對德、日兩國的佔領與政治系統重構作為上，顯現其霸權支配的痕跡。建立聯合國的目的在於「實現國際聯盟的崇高理想」，³²運作上雖強調「聯合國憲章」的普遍性原則，然而從權力政治的角度而言，則是「將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向全球性體系平穩過渡」，³³其中，常任理事國與「否決權」的設計，³⁴即反映出戰後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與重新支配的權力模式。尤其在安理會成員的考量上，更顯現「中國在和平會議上將迫隨美國」³⁵的策略盤算，以及透過在內部機制的權威性強制力量建構，確保美國意志實踐的可能。

事實上「雅爾達體系」（Yalta system）所形構的國際秩序，係奠基於傳統的「權力平衡」思考。³⁶而此協議係美、英、蘇三國討論戰後國際秩序安排與勢力範圍劃分的一系列會議之結果，在歷史意義上，除奠定各方勢力範圍的基本架構，同時也開啟後續的長期爭端。由於各方對勢力範圍劃分需求各異，利益

交換成為談判的核心，美方希望爭取蘇聯積極介入東亞戰局，早日結束戰爭。因此放棄在「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之前將中國視為最終打敗日本的構想，進而與蘇聯進行利益交換。而其作為的依據，乃由於中、俄之間無論在歷史傳統上、地緣安全上均存在嚴重的衝突，故中國在政策上勢必選擇傾向英美。³⁷

至於在循環結構層面上，歷史經驗顯示，貨幣、金融與貿易關係與戰爭的爆發密切相關，於是國際經濟合作成為選項，促使1944年7月布雷敦森林會議簽署重要的重建制度，以維持匯率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並鼓勵對外投資、籌措資金以促進戰後經濟復甦與發展；力圖避免關稅貿易保護與歧視性貿易政策，以促進國際貿易的自由化。透過聯合國組織建構國際上政治合作的基石，透過布雷敦森林體系在國際經濟合作上架構可能。³⁸於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即成為美國用以取代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的重要工具³⁹並藉以支持其「國際秩序」、「海洋秩序」建構的重要基礎。

戰後蘇聯的擴張，被認為是國際秩序的重大挑戰，於是杜魯門（Harry S. Truman）希望藉由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調停，阻止中國內戰的擴大與延續，然而情勢卻依然全面惡化，致使利用國民黨政府維持遠東安全與穩定的構想破滅。⁴⁰最後導致以「白皮書」、等待「塵埃落定」等作為來因應變局，並改變將日本「去軍事化」的思考，恢復其軍事工業與重工業，⁴¹以重新建構西太平洋秩序的執行者。而韓戰的爆發與冷戰的成形，更促使美國改變其對日

和約的政策方針，⁴²在戰略目標上，優先扶植日本，成為密切的同盟，並確保東南亞與西方的關係，阻止亞洲激進民族主義的發展。韓戰引發的兩極對抗中，毛澤東派兵參戰之目的，係消除史達林對中共的疑慮；⁴³更是「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⁴⁴省度其利益，係：透過韓戰，將投降的國民黨軍隊投入戰場，處理「忠誠問題」，另藉韓國戰場獲致蘇聯的軍事援助、處理剩餘混亂的軍火問題、建立共產世界的發言地位。⁴⁵而「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的地緣政治意義，即：將東亞沿岸與西太平洋納入美國的戰略疆界，以確保亞洲大陸不會發展出挑戰性的兩棲力量。⁴⁶據此，美國先後與菲、澳、紐、日等國簽署雙邊或多邊防禦條約，與南韓、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更於1954年9月簽署「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形成在亞洲大陸的東、南區域對共產世界的包圍。

以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地緣理論來看，係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保持美國的軍事優勢，以壓制蘇聯向邊緣地帶突破，進而挑戰西方的海洋秩序。⁴⁷整個1950年代美國的東亞政策，建構在分裂中蘇同盟、圍堵共產主義發展的現實需求上，認為地緣因素的限制，中共將勢必依賴蘇聯以取得資源，而能力有限的蘇聯必然無法滿足，故裂痕遲早會出現，因此，削弱中共即可有效遏阻共產主義的擴散，使東亞國家更親近西方。⁴⁸若以歷史發展來檢討圍堵戰略，可發現「現代強權在尋求圍堵敵人擴張之時，係綜合採用經濟封鎖與軍事措施」而此歷史經驗的延續，則可推論美國未來的策略運用，依然將「採取複合性的圍堵行動」。⁴⁹

1960年代末期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點意味著日本對於美國的保護與扶植，具有實質上的「荒謬」。日美之間由於「力量差距帶來的協調關係日趨

減弱」，「對等關係的危機」開始新的支配關係之調整與衝突，⁵⁰亦導致1960年日美安保條約的修改。隨著越戰與長期承擔的對外援助與軍事義務，造成美國在政治威望與經濟發展上的損傷。「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的出現，⁵¹促使1971年「新經濟政策」下，布雷敦森林體系的崩潰。而國際政治的多極化趨勢，使美國的支配地位，進入新的調整時期，透過1976年1月的「牙買加協議」(Jamaica Agreement)，成功的找到「經貿、貨幣制度上的支持」，⁵²另藉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以及自1975年開始的西方七大工業國家高峰會議(The Group of Seven, G7)，形構海權國家協商解決國際經濟問題的重要機制，與維繫海洋秩序發展的重要條件，更在國際金融危機當中，扮演解決問題的角色，⁵³亦使美國在多極體系與多元世界中，確保持續領先的態勢。

1970年前後，美國為避免身陷亞洲而嚴重影響全球戰略的主動權。自越南戰場脫離與改善中國關係，成為當務之急。藉中國以牽制、抗衡蘇聯的「三角戰略關係」成為主流戰略思考，以增加對抗蘇聯的籌碼，⁵⁴但同時也造成結構性的缺陷。因為，華盛頓的戰略選擇，必須要引導北京發展資本主義，但也因此很容易受中共的影響，⁵⁵美蘇關係成為影響美中關係親疏程度的變項，戰略主動在此就陷於結構性的框架之下。⁵⁶因而導致：區域性危機的影響程度超越兩強的全球性競爭，而其中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又超越地緣政治的影響力，但美國在這兩方面都未能有效的因應。⁵⁷

1979年12月27日，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實現其南下控制波斯灣、印度洋的目標，⁵⁸卡特(Jimmy Carter)將此「視為對美國核心利益的挑戰」。⁵⁹世界局勢重新轉為尖銳的對抗。迄至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主政，其基本戰略設計在於：「維持有效的赫

阻與圍堵，加強友誼建構與合作，以阻止威脅、緩和緊張局勢、促進爭端解決」，在太平洋地區的作為則是「強調美國的責任與合法的國家利益」，以及「對此地區發展與繁榮的貢獻」。⁶⁰雷根雖然發展出自越戰結束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但相對的，預算與貿易的「雙赤字」（Double Deficit）現象更為嚴峻。美國的回應則將「公平貿易」（Fair Trade）與「戰略性貿易」（Strategic Trade）概念成為法律。⁶¹透過「公平貿易」建立新的貿易規範，另藉由以政府干預、協幫出口、爭奪市場、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貿易」手段，重新擴大與對手之間的「經濟」差距，以彌補赤字。所謂「雷根經濟學」（Reagoneconomics）政策，係在國際上對抗採用「國家主導型經濟政策」的國家，迫使日本、韓國等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降低國家介入經濟領域的程度。⁶²透過各種不同措施，建構美國軍事力量增強、國際影響力擴展所需要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雖然造成西方盟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新的制度體系，透過「道德包裝」、「威脅制裁」、「國家出口戰略」（National Export Strategy）等手段的綜合運用，⁶³以及美國政、軍力量的支持，進而導致美日摩擦的緩和、經濟復甦、高科技領域的全球競爭力恢復。

伍、冷戰後海洋秩序的挑戰、回應與未來判斷

1985年，舒茨（George Pratt Shultz）提出：世界權力分配情況正有利於美國的預測。⁶⁴隨著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改革引發的「蘇東坡效應」，冷戰結束又代表著美國全球戰略的全面性調整。⁶⁵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特質：1. 美國權力的獨大特性；2. 大規模恐怖主義的快速成長與全球蔓延

特色；3. 經濟相互依賴的持續增加；4. 民主持續鞏固與擴展；5. 全球環境惡化的加速等。⁶⁶在此條件下，致使利益的界定、獲得、保護均出現不同的見解與爭議。就美國的挑戰而言，蘇聯威脅的消失，客觀上使盟國之間的政治合作關係日漸鬆散，日、歐脫離美國中心的環境已成形，日本成為「安全威脅」。⁶⁷然而，日本、或甚俄羅斯，均缺乏成為對抗美國海洋秩序的地緣條件。目前只有中共可憑藉其重要的國際市場地位，加上自然資源的自主性，以及領土廣闊與內部交通線的掌握，而成為唯一能挑戰美國海洋霸權與東亞兩極架構的國家。21世紀的和平與否，端賴中共是否會發展其海洋投射能力，挑戰美國利益與目前的東西兩極架構。歷史經驗使北京在發展陸權問題上，存在著既定的優先順序，先求陸界安全，再對付海洋。整體而言，中亞地區的戰略脆弱性，顯示其無法控制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亦難以在戰略上將海權列為優先。⁶⁸若北京企圖向海洋發展，挑戰美國海洋秩序，則勢必將面對猶如日本在二次大戰時期，「同時向陸、海兩線發展」的戰略困境。

由海洋秩序的歷史發展來推論，若能在「海陸權間，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勢下發展，則似乎有趨於平衡與穩定的可能。以歷史發展的線性關係來看，自1980年代開始，由於東亞新興國家實力迅速增長，因此美國的戰略構想轉而以控制海洋通道，加強作戰機動與高科技能力為核心，相對於中共的軍事重要性則明顯下滑，⁶⁹美中關係的主軸轉為如何透過經濟交往與制度約制，促使持續全面開放。但歷史終究不是線性方程式，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911事件」之後的新世界秩序邏輯，係將對世界秩序的追求，建立在美國單邊主義、強制性主導、劃分戰略區域以及減少對既定規則的承諾等基礎之上。⁷⁰其操作模式包括：1. 以經濟、軍事、技術優勢，主導國際秩序；2. 以美

國利益重塑國際制度；3. 以「合作機制」確保霸權地位；4. 以「先制攻擊」對付恐怖主義。此種新保守主義理念，過度強調單邊軍事力量的運用，對國際規則與制度的不信任而以美國的民主價值，要求徹底改變世界政治結構，⁷¹形成唯一超強的認定，加上強烈的自我中心「正義感」、「責任感」，進而發展出「新帝國」的概念，透過軍事力量的壟斷與獨佔，確保安全及內部穩定，執行其「約束其他國家但本身卻不受制約的規則與秩序」。⁷²然如此作為，則將會陷入「霸權興衰」的循環之中，而與長期以來的「海洋秩序」建構，阻止「霸權循環」發展的企圖相違背。事實上，任何大戰略的成功，均有賴於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之間的平衡，超越能力的目標追求，並沒有歷史上成功的典範。同樣的，中共的海洋戰略發展，亦存在「鐵畢茲式」的錯誤邏輯，自1985年起中共的海洋戰略轉換成積極性的「中、遠海防禦」，其目的在於：1. 政治上含括其主權主張，2. 經濟上確保海洋之運用，3. 外交上擴大國際影響，4. 軍事上加長國防縱深。⁷³根據劉華清的戰略構想，其所謂「三層防禦戰略」係以距岸150浬為內層，300浬為中程；而外層部份則沿海岸線展開，北起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南至南中國海，建構「中遠海防禦線」，希望在2050年能具有控制「第二島鏈」之作戰實力。⁷⁴而在普遍高張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認知裡，強有力的威懾武力才是政治與外交途徑解決爭端的保證，故縱使北京方面宣稱其防衛性的國防絕不對外擴張，並在執行程序上則是以其地緣的層次區分，以先印度洋後太平洋的方式逐步推展。但若以歷史經驗來看，相較於一次大戰之前的德國海軍發展，其建立「公海艦隊」（High Seas Fleet）的原初目的僅為德國殖民利益的保障，但其擴軍的行為，即便透過外交管道的說明，亦無法去除英國對於逐漸強大的德國海軍會危及大英帝國海上生命

線的疑懼，⁷⁵此情況在當今中共的對比形勢下，依然正在面對著如此的「困境」。

陸、歷史發展模式的建構－結論

回溯西太平洋地區歷史發展的足跡，筆者發現三種歷史模式。首先，當東亞大陸帝國勢力強大⁷⁶時，帝國對海洋秩序在建構，存在主導的意圖與能力，但畢竟受制於資源的侷限，故僅能以「朝貢貿易」⁷⁷的方式，建構一種特殊的「朝貢貿易式的海洋秩序」。然而，當東亞大陸帝國勢力相對衰弱時，海洋經營的意願與能力隨之減低，海洋的邊陲地位，加上海洋環境受勢力不易結合與動員能力不足的影響與限制，⁷⁸使大陸週邊的緣海國家，乘隙建構新的反華夷式西太平洋海洋秩序，但終究因為多重的限制，而在「競爭海權」的過程中，逐漸消耗能量。最後，當西方國家進入西太平洋海洋之後，由於係以生產（Production）、航運（Shipping）、殖民地（Colonies）為要素的海權概念，⁷⁹來建構其海洋秩序概念，故對東亞大陸帝國並無領土野心，僅有貿易需求，因此在不挑戰大陸帝國生存利益的前提下，透過海權的力量，組建武力震懾、經濟支援、制度規範等三個相互支援的循環架構，建構其西太平洋海洋秩序，並以此發展出特殊的歷史發展模式。而筆者認為此三種歷史模式之間，存在著某種特殊的時間、空間與人的組合，透過該種組合，即建構出歷史發展的驅動能量。

- 1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 Vol.22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54), p.24.
- 2 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p.6.
- 3 Fernand Braudel著,顧良、張慧君譯,《資本主義論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頁161。
- 4 相關問題參見何耀光,〈軍事史教育與戰略教育相關性研究:由軍史概念之建構奠定戰略教育之基礎〉,《國防部人力司92年度軍事教育專案研究計畫結案報告書》(2003年12月)。
- 5 依左傳記載,稱: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 6 所謂「流習」者意指:習水戰之兵士。
- 7 呂濤等編,《中國文明史》第二卷(先秦時期)(台北:地球出版社,1991年),頁189。
- 8 陳信雄,〈宋元的遠洋貿易船〉,《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年),頁13-38。
- 9 見宋名臣奏議,卷140。
- 10 按筆者,日本自唐代開始大量引入中國文明,華夷概念亦於此時成為日本所能接受的認知,歷經百年的演變,筆者認為,及至南宋滅亡之前,日本亦自認為其係屬於「夷」的地位,迄元滅宋,同為「夷」的蒙古人,打破「華」、「夷」的份際,蒙古這個「夷」取代中國「華」的地位,而成為「中心」,復加以忽必烈兩次「征日」的失敗,在合理邏輯的比對下,日本這個「夷」,亦應具備爭取成為「中心」的條件,而建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華夷秩序」在合理性上,即由此建構。
- 11 John King Fairbank & 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著,陳仲丹等譯,《中國:傳統與變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
- 12 Walter A. McDougall, *Let the Sea Make a Noise: A History of the North Pacific from Magellan to MacArthu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p.34-39.
- 13 綜合參考Dan E. Clark, "Manifest Destiny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 No.1, (1932), pp.3-4; Foster Dulles, *America in the Pacific: A Century of Expansion*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1938), p.4.
- 14 Michael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7.
- 15 M. Thomas Inge, *A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Reade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87), p.8.
- 16 綜合參考Tyler Dennett, "Seward's Far eastern Polic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8, No. 1, Oct. 1922, p.45; David Anderson, *Imperialism and Idealism: American Diplomats in China, 1861-1898*(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0;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22), p.408.
- 17 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p.269-270.
- 18 綜合參考何耀光,〈從牡丹社事件看台灣的地緣問題:從安全研究觀點的詮釋〉,《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0卷第4期,2006年8月,頁16-17;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354, 356, 358.
- 19 1899年9月12日海約翰訓令美國駐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國大使向駐在國政府遞交門戶開放照會,見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ransmitted to Congress December 5, 189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1), pp. 129-130.
- 20 Alfred Dennis, *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28), pp. 220-221.
- 21 綜合參考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Ian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 1894-1907* (London: Athlone, 1966); John King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pp. 555-556.
- 22 Donald W. Mitchell,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Sea Power*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pp. 204-210, 216-233, chaps.11, 12.
- 23 Michael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op. cit., p.206.
- 2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ransmitted to Congress December 7, 1909*(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4), p.15.
- 25 Lawrence H. Battistini,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5), p.72.
- 26 即包括:民族自決原則,門戶開放、貿易自由原則,公開外交原則,大國合作、集體安全原則,經濟合作與互賴原則等。
- 27 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p. 595-596, 567.
- 28 Kavalam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1945*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9), p.232.

- 29 G. C. Allen,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Control," in John Livingston et al. eds., *The Japan Reader*, Vol.1,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pp.378-383.
- 30 T. A. Bisson, "The Zaibatsu's Wartime Role," *Pacific Affairs*, Vol. XVIII, (Dec 1945), pp. 355-364.
- 31 綜合參考A.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8);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New York: G.P. Putnam, 1973);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7); 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2 William R. Keylor,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54.
- 33 李鐵城,《聯合國五十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頁52。
- 34 許光建主編,《聯合國憲章詮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83。
- 35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48), p.718, 716.
- 36 王德仁,〈歐洲格局的四次大變化〉,《世界知識》1992年第24期,頁16-18。
- 37 Gary R. Hess,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s, 194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66-69;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op. cit., p.718.
- 38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著,關在漢編譯,《羅斯福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500。
- 39 綜合參考Phyllis Bennis著,陳遙遙、張筱春譯,《發號施令—美國是如何控制聯合國的》(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頁86-88; H. N. Scheiber等著,熊必俊等譯,《近百年美國經濟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517-518。
- 40 資中筠,《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頁148-156。
- 41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84-88, p.104.
- 42 綜合參考崔丕,〈美國在東亞的遏制政策與千島群島歸屬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4期,頁197;劉維開,〈蔣中正與中日和約的簽訂〉,《「1950年代的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上海,2004年)頁1-2;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109。
- 43 周恩來曾說:「史達林到抗美援朝時才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見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302。
- 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50年10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556。
- 4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534-550。
- 46 Geoffrey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8), p.138.
- 47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p. 3-18.
- 48 蔡佳禾,《雙重的遏制:艾森豪政府的東亞政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71、126、143-149、215。
- 49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4.
- 50 かみや ふじ,《後史の中の日米関係》(東京:新潮社,1989年),頁29。
- 51 「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係美國經濟學家Robert Triffin所提出:認為美元與黃金的掛,「靠美國國際收支的持續逆差來支持各國儲備的增長和國際的清償力的增加,會使美元陷於兩難困境:如果美國扭轉國際收支逆差,保持平衡穩定美元,就會斷絕國際儲備來源,世界的清償能力就會不足;如果美國持續保持國際收支逆差,必然會影響美元的信譽並懷疑美元的兌現性,並引起美元危機。參見Robert Triffin著,陳尚霖、雷達譯,《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上海:商務印書館,1997年)。
- 52 相關運作方式參見張碧瓊,《經濟全球化:風險與控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頁204、203、222。
- 53 綜合參考鄭振龍、周婉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反危機功能評析〉,《國際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頁48-51;朱雪琴,〈國際貨幣基金(IMF):面臨角色的選擇〉,《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第22卷第6期,頁18-20;David Held等著,楊雪東等譯,《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295。
- 54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p. 763-766.
- 55 Jonathan D. Pollack,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in Douglas T. Stuart a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p. 290.
- 56 例如1979和1980年,美蘇關係迅速惡化。美國政府甚至故意發出訊息:考慮向中國出售武器,甚至進行共同軍事演習。見Banning N. Garrett and Bonnie S. Glaser, "From Nixon to Reagan: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merican Strategy," in Kenneth

- A. Oye, Robert J. Lieber,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Eagle Resurgent: The Reaga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 268.
- 57 William Bundy, *A Tangled Web: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8), p.529.
- 58 劉競、張士智、朱莉,《蘇聯中東關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265。
- 59 K. Jadson Mitchell, *Ideology of a Superpower: Contemporary Soviet Doctrin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7.
- 60 Geoffrey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op. cit., p. 197, 199.
- 61 Stanley D. Nollen & Dennis P. Quinn, "Free Trade, Fair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n the U.S. Congress, 1987-198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3, Summer 1994, p.491.
- 62 王新奎等,《中國:發展中國家與WTO》(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年),頁4-5。
- 63 綜合參考Helen V. Milner & David B. Yoffie, "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A Theory of Corporate Trade Dema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3, No.2, Spring 1989, pp.255-257, 261; F. Buelens,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ll the US Open Door Trade Strategy Continue?" *Intereconomics*, Vol.32, Jan/Feb 1997, p. 47; 錢士安,〈美國貿易政策史:1765-1997〉,《美歐季刊》1997年第12卷第2期,頁62。
- 64 George P. Shultz, "New Realities and New Ways of Thinking," *Foreign Affairs*, Vol. 63, No.4, Spring 1985, p. 78.
- 65 John Dumbrel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rom Carter to Clint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193.
- 66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op. cit., pp.13, 19-20, 27,31, 36.
- 67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33, No.1, Jan/Feb 1991, p.3.
- 68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pp.90-94, 103, 105.
- 69 Zhang Jia-Lin, "The New Romanticism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Asian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XXI, No. 10, October 1984, pp. 997-1010.
- 70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2004, pp.609-630.
- 71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Survival*, Vol.46 ,No.1, Spring 2004, pp.7-22.
- 72 Stephen Peter Rosen, "An Empire, If You can Keep It,"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71, Spring 2003, pp.51-61.
- 73 相關資料參考何耀光、胡興梅,〈廿一世紀中共海軍戰略發展對我國海軍戰略影響之研究〉,《展望西元二千年兩岸軍力平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空軍官校,1997年),頁232-243;Hwang Byong-Moo, "Changing Military Doctrines of the PRC: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War and Technology,"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11, No.1,(Winter/ Spring, 1997), p.239.
- 74 Jeffery B. Goldman著,林敏譯,〈西方眼中的中共馬漢-劉華清〉,《國防譯粹》第24卷第1期,1997年,頁83-86。
- 75 綜合參考F. C. Fuller, 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上)(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229-236;Eric Hobsbawm, 賈士衡譯,《帝國的年代》(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461-463; Jonathan Steinberg, *Yesterday's Deterrent: 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Raffael Scheck, *Alfred von Tirpitz and German Right-Wing Politics, 1914-1930*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8).
- 76 其勢力之強弱標準的判斷,係以能否具備可處理或管控北方游牧民族威脅為判準。
- 77 所謂「朝貢貿易」體制的發展,係自明朝以後才臻於完備,配合海禁措施,使朝廷獨佔海洋利益,但其運作之原形則可追溯自秦漢。
- 78 曹永和,〈明洪武朝中琉關係〉,《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90年),頁338-344。
- 79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396-398。